

·文献学苑·

## 漫谈宋代科举考试与图书业的关系

沈如泉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 宋代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图书编撰、刊刻、流通诸领域的活力,促进了宋代图书业的发展。同时,宋代图书业的发展又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更多便利服务,大量图书的编印流通也为宋代社会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科举考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宋代科举考试和图书业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为用、相互促进的。

**关键词:** 宋代 科举制度 图书业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1-0120-03

###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Book Industry of Song Dynasty

Shen Ruqu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generated the vitality of books' compilation, inscription and circulation in Song Dynasty, which promoted the book industry at that time.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industry provided much facilitation for educated population,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book publications laid a profoun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which, in turn, was much beneficial for the selecting of talents. In general,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book industry of Song Dynasty were reciprocal.

**Key words:** So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s; book industry

CLC number: G256.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1-0120-03

我国的科举制度滥觞于隋,奠基于唐,而到宋朝可谓体制大备,基本定型。宋朝建立后,颇重文教,以科举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取士不问家世,使孤寒登云有望;各地兴学立校,读书蔚然成风。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完善,导致宋代社会结构和社会风俗发生巨大变化,从此,个人的知识才能取代了门第血统,读书中举成为士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与科举考试的发达相关,五花八门的考试用书也应运而生,书商大量刊刻此类图书以满足考生需要,不但自己从中牟利,同时也促进了宋代图书业的繁荣昌盛。

宋代科举考试名目繁多,每科考试重点也不一样,其间又屡经变革,但是考试的基本内容则相对集中在对经史之学与诗赋策论等文体写作能力的测试方面。作为考生要熟知经典并擅长写作,首先必须要读书。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版印书籍取代手抄图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发达

的刻书业则有效地保证了书籍的大量印行,而遍布城乡的书市、书坊所构成的销售网络又为书籍流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

宋代刻书可以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类。官刻书籍,主要侧重于儒家经典和正史。其中以国子监刻本为最佳,因为监刻本都经过认真校勘,讹误极少。官刻本的其它刻印单位还有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等。宋代官刻本定价出售,可供人购买。虽然官刻经、史的目的并非专供举子考试之用,但对于考生来说,官刻经、史类图书因为具有准确、权威的特点,于是就被视为最基本、最重要的考试用书,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国家统编教材。当然,书坊出于牟利目的,也会刻印此类图书。不过坊刻本质量难以保证,商家为减少成本往往肆意删节原文,又极少校勘,以致错讹百出,不免贻误学者。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

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金’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金’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sup>[1]</sup>姚祐因为使用福建麻沙本而错会书意，作为考官，不过在命题时闹一笑话，如果考生在考场上答题时写错经书文字，恐怕是要因此而葬送大好前程了。

除了基本用书，宋代举子应考还需要很多辅导材料。首先是程文，所谓“程文”，即科举考试中可用作示范的文字，因为应试者必须依此程式作文，故称“程文”。为了应考，举子必须熟读前辈程文，从中领会考官命题重点和考试作文方法。宋代书坊商人，往往将名家程文汇编成集，加以雕印，以供士子揣摩研习。宋代程文流行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苏辙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札看出来，他写道：“今之学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刀锥之利，高立标目，镂板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新近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规。忘道尚华，去道弥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倘有可传为学者式，愿降旨付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板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sup>[2]</sup>从苏辙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书商为了扩大图书销量，做出不少努力，“高立标目”是在编选方式和内容方面加强工作，吸引考生注意力；而“镂板夸新”则说明书商根据需要随时修订图书，不断推陈出新，以迎合市场需要。书商努力的结果是将程文传之四方，考生学程文变为时尚。一些急功近利的考生则舍本逐末，以看程文代替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甚至将程文用作考场剽窃之资，这就损害了文风和学风，从而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如苏辙就奏请宋徽宗下令禁止擅自买卖程文，并建议由政府出面，统一编刻发行此类著作。苏辙的建议虽得到徽宗批准，不过执行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不如书坊经营灵活，编印工作常常滞后，跟不上市场变化。其次，既然存在市场需要，在利益驱动下总有商人会冒险违禁，单靠行政命令一时禁绝很难办到。据记载，直到南宋庆元年间，仍有一些不法商贩将私刻程文改头换面，投放书市，和政府所编程文一同出卖。

其次是类书。宋代类书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特别是词科考试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过去较少有人留意，所以本文对此介绍稍微详细一些。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科举改制，以考经义代替考诗赋，其弊端不久暴露出来，那就是文学之士锐减，造成朝中代言乏人的现象。作为补救措施，北宋增设“宏词科”，到南宋又发展为“博学宏词科”，以选拔学问广博，辞藻华美的人材。此科考试极难，考生想中选不但要文笔优美还必须博古通今。考生对于儒家的九经

以及十七史，先秦诸子，都必须详加涉猎，烂熟于胸，而且对于本朝典章制度也要清楚明白。不过一旦考中往往能够得到美官要职，因此吸引了大批举子投身其中。

因为词科考试面太广，所以考生在读书的时候往往要作札记，以防遗忘，宋人称此为编文。编文包括编题与编语。编语主要是将经、史、子、集四大部书中可用为写作材料的语句进行摘录编类，未必尽是佳词妙语，关键是可将其组织成四六文（宋代骈文）偶对材料，因为宋代词科考试主要考察四六文体的写作。洪迈所编《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等就是编语类书。所谓编题就是将经、史、子三大部书中有可能在科举考试中用来出题或者写作中可做引用的典故摘出，分类编册，集部书中一般是不出题的，但是行文时经常需要引用或化用前人成句，所以也要作摘录。摘录时不抄全文，只加节略，积累日久，材料丰富，便可分门别类装订成册，这样既可当作每日学习的总结，又便于考前复习。这和编排类书颇为相似，事实上有些编文之作后来经过刊刻就是类书。例如王应麟所编《玉海》、章俊卿所编《山堂考索》之流，今天已成类书中名著，而在当时就是为举子们应考博学宏词科而作的编文。

王应麟在《玉海》中关于如何编题有详细介绍，今只节引一段：“西山先生（真德秀）曰：‘始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既识梗概，然后理会编题。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经书中《周礼》题目最多，官名皆可作箴，制度、名物皆可为铭、为记。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工夫多在三礼，有题目处，须参注疏。次及《国语》、《战国策》、《史记》、两《汉书》、荀悦、袁宏《汉纪》、《三国志》、《晋书》、《隋书》、《唐书》，唐朝诸帝《实录》、《旧唐书》、《通典》、《唐六典》、《唐会要》、《贞观政要》，本朝诸帝《实录》。本朝题目，须是盛德大业，礼乐文物，崇儒右文等事方可出。子书则《孟》、《荀》、《扬》、《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墨》、《韩非》、《子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缭》、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集则《文选》、《文粹》、韩柳文、《文苑英华》、《古文苑》、《皇朝文鉴》，虽无甚题，然可以引用处亦合编录。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俟诸书悉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sup>[3]</sup>下即开列自天文、律历以下凡一百三十八门，编排体例与类书编纂并无二致。

不过，一般读书人手头很难同时拥有这么多图书供采录，就是有，许多人也下不了苦功夫。因此书坊就大量刊印类书，方便考生。当然，类书不仅对应试词科的考生有用，对

于参加贡举和制科的考生以及一般读书人也有工具书的作用。宋代刊印的类书有前代人所作的,如梁朱澹远《语丽》、北齐祖珽等《修文殿御览》、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李商隐《金钥》等;也有本朝人编撰的,除前举王、章二书外,还有大部头的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篇幅稍小的如晏殊《类要》、吴淑《事类赋》、袁轂《韵类题选》、钱珣《史韵》、叶廷珪《海录碎事》、江绍虞《皇朝事实类苑》、叶凤《群书类句》、吕祖谦《观史类编》、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杨咨《歌诗押韵》等,以及书坊所刻不署名的《书林韵会》、《锦绣万花谷》等。

第三类是诗文写作方法类图书。这些书中有些是专为考生指点应试途径而作,如魏天应编《论学绳尺》与王应麟编《辞学指南》之类。也有一些本非为考生应试而作,但在考生练习写作阶段,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考生把握写作格式与创作规律,因此也可视为考生学习参考资料。其中总论文学创作规律及介绍各体文学体制特点的综合类著作有梁刘勰《文心雕龙》、蜀冯鑑《修文要诀》,本朝陈骙《文则》、李涂《文章精义》等。还有专论某种文体格式及写作方法的格、式类著作。如诗格类有唐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本朝梅圣俞《续金针诗格》、李淑《李公诗苑类格》、释惠洪《天厨禁脔》等;赋格类有唐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白行简《赋要》、后梁和凝《赋格》及本朝马偁《赋门鱼钥》等;文格类有唐孙邕《文格》、王瑜卿《文旨》等。

第四类是作品集。为了提高写作水平,考生还应熟读名家名作。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学总集如《文选》之类,是不能不熟悉的。宋代俗语说“文选烂,秀才半”,正说明此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之大。还有不少带有名家评点的诗文选集,也颇受考生欢迎。这些书往往为名家所选,选文质量较高,在评语中中还

常介绍写作方法,也有引导初学者写作入门的作用,同样是考生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真德秀编《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轨范》等。此外,前代一些重要作家的别集也要充分重视,特别是对唐代名家如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的诗文集更要认真学习。考生还要学习本朝人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曾经主持过科举考试或号称一时文章宗主者的作品最容易成为取法对象。北宋欧阳修就曾成功地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选拔出一批古文名家,进而引起考生群起效仿,成功地推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进程。再如宋室南渡以后,苏轼文章非常流行,考生如果不认真学习,就有落榜危险,于是有人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正因如此,所以南宋时期出现了多种苏集刻本。

以上概要地介绍了在科举考试影响下宋人编印刊刻相关书籍的一些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图书编撰、刊刻、流通诸领域的活力,促进了图书业的发展;作为回报,宋代图书业的发展又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更多便利服务,大量图书的编印流通也为宋代社会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科举考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总体看来,宋代科举考试和图书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彼此为用,相互促进的。

参考文献:

[1] 朱彧.萍洲可谈[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 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沈如泉(1971-),男,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上接第115页)是在学术研究中,在家谱里看到某著名文人的作品,而此前又未曾出现,以为发现了此人的佚作,便奉若至宝而大加宣扬,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贻害不浅。相比较而言,那些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所编纂的家谱,则较少有伪托的现象,这些家谱中的各种资料,一般仍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1] 常建华.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A].谱牒学研究(第一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 一至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 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

[5] 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6] 归庄撰.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7] 朱彝尊撰.曝书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49(无准确出版时间).

[8]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 (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张伯驹.素月楼联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 束景南.朱子佚文辨伪考录[A].朱子全书(二十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39-840.

作者简介:张廷银(1965-),男,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研究馆员;石剑(1979-),女,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